

臺灣抗日軍領袖丘逢甲

蔣君章

捲走十萬餉銀之謎

凡是稍讀歷史的人，都知道光緒二十年即甲



臺灣抗日軍領袖丘逢甲

午年（西元一八九四年），中日之間以朝鮮問題而發生戰爭。結果，滿清政府所屬的海陸兩軍都告慘敗，締結馬關條約以和。馬關條約中，有一條是清政府割台灣澎湖給

日本。台澎人民竭力反對，用各種方法阻止清廷同意這一條，沒有達到目的，則宣布脫離清政府的管轄，組織台灣民主國，取年號曰永清，表示永遠擁戴清政府的忠忱，也表示了這是反對日本的統治，不得已而出此。台灣民主國，是亞洲第一個民主國，其大總統則為原任台灣巡撫的唐景崧，其民軍領袖，乃台籍進士丘逢甲。我們也可以說反對割台最激烈的是丘逢甲先生，組

織以永清為年號的台灣民主國的中心，也是丘逢甲先生。丘逢甲，不僅是台灣的民族英雄，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民族英雄。作者初讀史書時，對丘逢甲即有此認識，故景仰甚深。

其後，作者又讀到興寧學者羅香林先生的乙堂文存，其中有一篇丘逢甲的傳略。在這篇傳略中，我特別注意丘逢甲在台灣抗日失敗以後，潛渡廣東，他還是念念不忘於台灣的光復，每於百無聊賴中，佇立海濱，東望興嘆，至鬱憤達於極點時，虬髯畢舉，誓吞敵人而甘心。因命名其所居曰念台山館，而字其子孫曰念台，丘先生畢生是以復台為職志，及生倘難實現，則寄其希望於子孫。其志其節，更使我欽佩不已。

作者曾在本刊發表過一篇台灣抗日烈士羅福星，羅福星之被派赴南洋教書，就是丘先生在督廣東學政的時候。他賞識這位富有民族意識的青年志士，要他赴南洋，名義是教授生徒，實際上要他聯絡革命志士，做復台的工作。這位年青人到了南洋以後，席不暇暖的跑來跑去，始終以教

書為掩護，與革命先進胡漢民等相往返，把復台工作，納入反清革命的主流中。後來，他在福建光復以後，即來台灣，致力於抗日的革命工作。這一抗日運動的種子，便是丘先生所播下的。

作者曾讀連雅堂（橫）先生的台灣通史和署名漢人的台灣抗日史。前者有丘逢甲的傳，後者有一段關於丘逢甲抗日的記載。二者都有一段，說丘逢甲在台灣抗日失敗後，捲走了民軍的餉銀十萬兩。作者對此，頗表懷疑，提出下列的問題，認為此種記載，恐與事實不符，有厚誣先賢的嫌疑。作者的問題如下：（一）台灣民軍的餉精，十分缺乏，各方認捐的數量，只有林本源的一分較大，當時民軍對這一家台灣的首富，期望甚高，希望捐助一百萬兩，但林氏實際所出的只是幾幾之數，這也難怪，因為林家是大地主，不會有現存的一百萬兩白銀存儲備用的。因此民軍是否有十萬兩存銀而不發放給部隊？殊成問題；（二）十萬兩銀子，合六千二百五十斤，在五噸以上，用現在普通卡車來運，也需要兩輛；當時還沒有卡車，只有用人力來挑，每人挑一百斤，則需挑夫六十多名，這是一個相當規模的運輸隊，但先生生在民軍抗日失敗以後，到處躲躲藏藏，歷一個多月始得出險，他能够在極度艱難的流亡，帶著這麼龐大的運輸隊而不被敵人發現嗎？（三）唐景崧棄職而逃，在淡水口外登上外輪，被炮台守卒所知，即發炮予以射擊，足證台胞對不忠實於台灣民主國的人之憤懣極深。丘逢甲到處流亡，志在脫險，其性質與唐景崧無異，他如果真的帶着六十多人替他運輸十萬兩銀子，他不被運輸隊人

打死而瓜分其銀，是勢不可能的。（四）即使民軍真有這樣鉅額的帑藏，存在銀行錢莊之類的金融機關，時戰事方急，內台交通，幾已隔絕，匯出去勢無可能，在這樣小的地方，其消息亦無保密之可能。（五）丘氏為祖代相傳的愛國清廉之家，其取捨有其嚴格的祖訓，而且丘逢甲在考中進士以後，對有收入的鄉間邀請主持婚喪喜慶，都嫌惡其繁而竭力避免，足證他不是一個愛錢的人。（六）如果丘逢甲真的帶走了民軍餉銀十萬兩，這不是一個小數目，渡海以後，他應該是一個富翁，但是我們在他的生活中，尋不到他是富翁的事蹟。因此，作者認為這種傳聞不實的事，史家加以記載，誠使人有「盡信書不如無書」之感了。

中原南遷七百餘年

關於丘逢甲先生的傳記，問世者已不少，作者的感覺，或失之略，或失之偏，未必能够了解這位民族偉人的全貌。因就手頭所有的資料，證次其生平，意欲使丘先生愛國家愛民族的精神，能使世人作更多的了解。不過作者要特別說明的，我的資料，僅限於手頭所有的，如嶺雲海日樓詩集與嶺海微颺等，參考不周，致有同樣發生掛漏之弊，還望讀者多加指正，至他家已有敘述者，本文為避免重複，不再引述，或僅簡要涉及其重要部分，使讀者得窺丘先生的整體精神。

台灣的丘氏，遷自廣東的鎮平，這本是河南的縣名，後來因為避免重複，改稱蕉嶺。蕉嶺是廣東嘉應州（舊稱梅州）所屬的五縣之一。我們

從鎮平這個地名來觀察，即可知道先生的祖先，係自中原遷來，因為移民常常把原住的地名，帶到新定居的地名。如潮州人移至屏東的一個地區，即命名其地為潮州，英格蘭人移至北美即名其地為新英格蘭等，都是例子。台南市外的安平，也是閩南移民的故鄉地名，中外古今，都是常見的事，不足為奇的。

固然，台灣的丘氏，遷自廣東；而廣東的丘氏，遷自中原。試看丘念台先生下面的一段話：「我的祖先，是屬於中原南遷的客家族系。根據可靠的資料，由南宋的遼、金、元之亂以後，他們還過着間歇性的移民生活，已經七百多年了。直到明初，才算在南方各省定居下來。由於長期的流動生活和不斷的與陌生環境戰鬥，使客族後代都養成刻苦耐勞的習慣；同時遵守一項遺訓：牢記祖宗是因外寇侵陵而輾轉南遷的，所以後代子孫，無論落籍何處，都必須勤耕苦學，奮發圖強。」（嶺海微颺第一章第一節）

「談到中原客族南遷的原因，在表面上看，他們是為避免寇亂；但從深一層去研究，便可發現他們隱藏有一種崇高的理想，那就是長期的民族奮鬥。每當外族侵據中原時，他們不願意在異族面前屈膝，不願意做亡國奴，所以常常聚集志士，幫助王朝抵禦外侮；不過當時客族諸姓，儘量各自聚族而居，都沒有好好組織訓練，無法作進一步的聯繫；到了王朝的中央領導機關解體以後，……他們就入山耕作，自保文教，不再涉

及政治了。」(同上)

「客族……由大陸中原諸省隨宋室向南方徙居，其中大部分落籍福建、江西兩省。到了元兵入寇，他們又隨着宋室播遷廣東。……當時廣東的水陸交通的交匯東、西、北三江地區，已居住很多的廣府人，而沿海潮、惠、高、雷、瓊一帶肥沃之地，亦早已爲福佬人所進住；因此客家人只有在山丘地帶尋求發展了。廣東東北的梅州，一稱嘉應州，以梅縣、興寧、五華、蕉嶺、平遠爲轄區。因爲毘鄰福建和江西兩省，山嶺重疊，林木叢密，恰好是客族遷入發展的目標，所以梅州便成爲後來客族分布聚居的中心了。」(同上)

以上是丘先生敘述廣東客家的來源，丘氏是客家的一部分，就是在這個中原大移民中跟着南下的。丘氏進入廣東的時間，是在南宋的末年。念台先生又有如下的一段敘述：

「南宋末年，文天祥在江西爲元兵所敗後，乃進屯廣東潮陽。當時閩贛兩省擁護宋室的許多義民，都相率跟着遷移。我們丘氏先祖，就是在這一時期由福建汀州寧化縣遷居廣東梅州鎮平縣的。梅州是宋時的建制，清代改爲嘉應州，鎮平縣則於民國四年改爲蕉嶺縣，原因是避免河南省南陽府的鎮平縣混淆一起。」(同上)

從念台先生的敘述中，可知在丘氏未入鎮平縣時，已有鎮平之稱，可知那裏早已有河南南陽府鎮平縣移來的客家人；如果丘氏之移入鎮平，是因

爲那裏已有同鄉居住的關係，那末丘氏的原籍是南陽的鎮平，是相當可信的。其始遷入粵者爲丘夢龍，其子創兆曾參文信國墓。

族居由宋元明而降

鎮平這一支丘氏是什麼時候，遷到台灣來的？根據丘念台先生的記述，是在清嘉慶年間。念台先生說：

「自丘氏祖先定居鎮平，衍傳到我這一代(念台先生)，已歷二十二世；但從十八世以後的五代，是由鎮平移民到台灣。……在那個時代，大陸廣東和福建，有許多壯丁遠去南洋謀生，有的捱過一生甚至數代，必待積有相當財產，然後實現其衣錦榮歸的好夢，有的則認爲故鄉缺乏發展機會，乾脆在旅居地改變籍貫，從此一去不回頭了。我們移居台灣的祖先……却沒有像他們那樣的打算。一般認爲不論生活環境如何，每年必須回鄉祭祖或省親一次，且垂爲子孫的遺訓。當時，有些人認爲這樣的祖訓，簡直是替子孫增添麻煩；實則，他們既昧於慎終追遠的古訓，更不瞭解客家人的傳統的家教。」(同上)

由此，可知丘氏這一家族，特別重視祖先和祖先的遺訓，雖然由台灣至蕉嶺，要冒渡海的危險，更有登山涉水的辛苦，但是他們恪遵遺訓，奉行不喪。故丘氏與原籍的親族，保持密切的聯繫，日人來台後，很自然的回返老家，丘逢甲先生在回返故鄉後，題一聯於所居曰：「地勢居閩

贛粵之交，環百里自成小聚；族居由宋元明而降，從廿世再數初遷。」逢甲先生的故鄉觀念與祖宗觀念特深。這一觀念，就是他國家觀念特強的濫觴，愛家、愛鄉、愛國家的思想體系是一貫的。這是中國文化的特點之一，因此產生了「數典忘祖」是黃帝子孫的恥辱的一種普遍觀念。我們當代的青年，對此應特別注意。這是作者所以要詳述丘氏家世的原因所在了。

台灣的丘氏，自其遷粵十八世祖丘士俊起，他們這一支就遷到台灣來了。大陸移民來台最盛的時期，是在雍正年間。清代自聖祖以後，對移民來台，懸爲厲禁，尤其是對廣東人之來台，禁止更嚴，這是施琅的主張。但雍正自在藩邸時期，與諸兄弟爭嗣位，即已注意在廈門建立基地，而以台灣爲後盾，所以他對台廈十分注意。及接帝位，雖未撤消渡台禁令，但並未嚴格執行，故閩人來台者甚衆，估計連乾隆一代的走私來台者在內，當不下百萬人人上下。台灣經此盛大的移民，沿海平坦地區，幾已盡爲漳泉人所佔。丘氏來台已在嘉慶年間，平地及接近平地的山坡地，已無插足的餘地，只好深入內地，在舊屬彰化，現屬台中縣的東勢地方落腳。那個時候的東勢，是平地同胞與山地同胞的質選貨物的地區，還是草萊未闢的處女地。丘士俊先生憑着萬能的雙手，在此開墾，居然能够自成局面，這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情。

那個時候的東勢，有兩大禍害：一個是疾病盛行，一個是山胞的出草殺人。但是丘士俊身懷武功，有一套拳擊的技術和一套刀法。憑他一把

大刀和一身武功，山胞的出草，對他們一家奈何不得。故丘氏定居以後，聲名漸振，來東勢開墾者漸多。丘士俊便設立國術館，傳授門徒，成立一個防番組織。地方上便再也不怕山胞出草了。由是奠定東勢開發的基礎。丘士俊不但有好武藝，而且他還有任俠的性格，純樸剛直，扶弱抑強，地方上如有爭論，只要他說一句話，糾紛即告解決。地方秩序，為之井然。別處的強梁，對東勢也不敢冒犯。這位丘士俊先生便是丘逢甲先生的曾祖。他的保衛地方，正是客家忠勇保鄉的傳統。其子學祥，能繼承其衣鉢，精武術，尚義俠，又好打抱不平，不畏強禦，不欺弱小，而且更是公平非凡。如有被欺侮的一方，求助於他，他一定挺身而出，迫使理屈的一方陪罪和解，否則他就要不客氣的飽之以老拳了。因為他精於武術的，所以誰都不肯觸犯他，因此維持了地方的正義，解決了不少的糾紛。那個時候的東勢，還是天高皇帝遠的地方，像他那樣的人，便成為不可缺少的人物。丘學祥的武功究竟有多少高？丘念台先生曾經有過一段口述：

「曾祖學祥公的一代，十足地承襲了高祖的衣鉢，在拳術上固已盡得祕傳……他練的拳術，是屬於何門何派？後代已難考據。就傳聞所知，他對內外功都有修養，常常公開表演，他的腕力，能在七、八尺長的木桿末端，兜起一桶水；又右手攜刀，左手執着藤盾，縱躍五尺高的圍牆，往返毫不費力。……據說，這些小玩意，是在教學生徒時表現的。……學祥公晚年，地方漸次平

靜，人民各安生業，他的剛銳之氣，也已收斂甚多。……但他為了預防萬一，仍然時常帶着隨身武器，只是一枝笨重的鐵拐子而已。聽說，他這枝鐵拐子，使用起來，真可了不得，即算對面四、五人的刀槍棍棒，也能應付裕如，確保安全。」（嶺海微颺第一章第二節）

以父作馬望子成龍

由此，可知丘氏遷台的第一代和第二代，都是武術名家，丘氏這一家族之所以能立足於東勢，便是靠着他們一生的本領。但是，到了第三代，丘龍章的時代，情形便不同了。由於東勢社會秩序，已經安定，武術防身的需要，已經不多。同時丘龍章看到他父親為了打抱不平，常常受傷，他認為學會了武術，反增加了受傷的機會，因此他就厭於此道；而且他秉性好文，喜讀書；雖然丘學祥對兒子不能接受他的家傳武學而不滿意，但亦不能相強。丘氏自此轉向文事，因而有丘逢甲這樣一位在文章和抗日事業上突出的人才。

丘龍章雖然舍武習文，但他仍有他父、祖兩代堅持奮鬥的意志，不達目的，誓不休止。他的目的，是屬於卓之無甚高論的不重空想的一派，他的勤修苦讀，旨在獲得一名秀才和舉人，他終於如願以償的考中一名「台灣秀才」。台灣秀才，在科名中含有若干藐視的意思，台灣歸屬於清政府後，並不在台發展教育，亦不在台開科取士，士子求取功名，需要到福州去應考。後來，清廷

總算皇恩浩蕩，同情台灣學子赴試福州的道遠路苦，特別命令福建巡撫或學台，他們辛苦一次，到台灣來開考。又因為台灣文風不甚，所以錄取標準較低，因此福建的落第人士，有的抓此漏洞，不辭辛苦而來台應試的。故台灣秀才一詞，多少帶有一種譏刺的意味。越南亦開科取士，同樣有秀才舉人進士的科名，但越人以得清政府考試時榜上有名為榮，其中的道理，是完全相同的。但是丘龍章這位台灣秀才，確有真才實學，所以他後來又得到貢生的頭銜。貢生是各州縣中學行俱優，特加選拔，貢諸京師，升入太學，以應另外一種考試。丘龍章得到貢生的頭銜，足證他和一般的台灣秀才不同。但是他的家庭環境，已經不許可他進一步的求取科場功名了。由此，可知丘氏顯然是開闢了東勢的一片荒地，但是他不同於其他台灣各地的開荒者，他們往往成爲大地主，成爲豪富之家；而丘氏只是本地地過他們清苦的生活，致使丘龍章連赴省應鄉試的資斧都成問題，這是特別值得我們稱道的。清廉是丘氏祖先的另一遺訓。丘龍章就是丘逢甲的父親。他既中了秀才，不免應邀坐館，教教學生，讀讀書，過着「半飢半餓清閑客，無鎖無枷自在囚」（鄭板橋自嘲詩）的生活，但是丘逢甲這位傑出的人才，就是他調教出來的。他字詒臣，號潛齋，那時候，台灣知識分子提起潛齋先生，都是肅然起敬的。

丘龍章生有七個兒子（此據嶺海微颺，但據倉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譜，則謂「公兄弟十人，姊妹四人，成人者九人。」），長子先甲，次子逢甲

三子樹甲，四子瑞甲，五子兆甲，六子同甲，幼子世甲。同甲、世甲皆早逝。父子六人，三個是秀才，一個是進士，兩代讀書人中，有如此的功名，在台灣真算是科名鼎盛了。丘逢甲生於清同治三年（一八六四年），是歲為甲子年，甲為天干之首，子為地支之首，此在宿命論的觀點來看，是一個祥瑞的吉兆。其時丘龍章正在今苗栗縣銅羅灣的李氏（據年譜，嶺海微颺作丘氏）學塾中授徒。他特別給他的次子取了逢甲的名字，還給了一個號，叫做「仲闕」，仲是他的排行，「闕」字是闕逢的簡稱，是甲子年的另一名稱。

丘逢甲後來又字仙根，別署倉海，他似乎對道家學說有信仰，仙根殆由此而來。丘氏的祖先，有義俠之風，而他所處的時代，有失台之痛，此當為他別署倉海的來源。倉海是秦時朝鮮的郡名，張子房要刺殺秦始皇，在倉海君那裏得到一位力量使百斤鐵錘的大力士，是即博浪沙中椎擊秦始皇的人。倉海君有義俠之風，由此可知。丘逢甲的詩，有句云：「我不神仙聊劍俠，仇頭斬盡始升天」，這句詩中的仇頭當指侵略台灣的日本人，故丘逢甲的愛國熱忱，半出先天的秉賦，半出於後天的環境，讀其詩可以想見其人。

丘逢甲既束髮受教，他的老師，就是他的父親。他的天賦極高，讀書過目成誦，六歲即能屬對吟詩，七歲即能屬文，因此深得父親的愛護。在他父親嚴密管教之下，他對於貼括之學，垂髫時已能通順，而且做得很好。到他十四歲的時候，他已經具備應試考秀才的學力了。但是清朝政府的規定，考秀才必須年滿十六歲；丘龍章先生

決心要他去試一試，於是把年齡提高了兩歲，親自送他到台南去應考。他家仍然住在東勢角，羅香林教授說他是彰化翁仔社人，意或當時的東勢，是山胞的翁仔社乎？是否如此，待考。從東勢到台南，只有陸路，要走七天，而且常經翻山涉澗，自然非常的辛苦，逢甲年幼，有時因兩足生泡而艱於行走，龍章先生憐之，常背負而行。好不容易走到了嘉義，遇到了一位也是秀才的老友。老友問龍章先生意欲何往？龍章先生答以其子將赴台南應試。老友謂年紀太小，怎可赴試？龍章先生答稱：他喜歡參加，讓他試試看，老友欲試逢甲先生的學力，半開玩笑地出了一付對子的上聯，要逢甲先生對下聯，他的上聯是「以父作馬」，逢甲先生含着羞慚的臉色，略加思索，答稱：「望子成龍」，這位秀才先生聞而大悅，稱為奇才，還特別留他們吃了一餐飯。

甲年甲子丁歲丁公

那次主考的學台姓丁，似乎就是後來在担任清政府北洋海軍提督的丁日昌，是一位愛才而又清廉的能吏。是李鴻章門下的要員，丘逢甲初次至台南那樣的政教文中心，又是初次進考場，兒心未脫，興趣十足，進場以後，得到了題目，振筆直書，未到交卷時限，他便已繳了卷，是第一個交卷的人，適值丁學台巡視考場，以為這樣小的小孩子，卷交得這樣快，一定是做不出文章，交了白卷。及詢問其名字，頗感興趣，因觸動靈機，出一副對聯的上聯，要他做下聯。丁學台的上聯是「甲年逢甲子」，這是相當難對的。可是

丘逢甲在略加思索之後，很有禮貌的答出下聯來，竟使丁學台嘆為奇才。他的下聯是「丁歲遇丁公」，是年適為丁丑年，而學台又是丁公。對得既極工整，而且更適時適人，無怪丁學台為此贊許不止了。丁學台又命丘逢甲用俗不傷雅的字句，詠台灣的風俗，稱為台灣的竹枝詞。丘逢甲在不慌不忙的做了一百首，也頗使丁學台滿意，竟謂這個童生才氣高，只看對子和竹枝詞，不必再看文章，便可決定錄取了。榜發，丘逢甲固然榜上有名，且居第一，是台灣最年青的秀才。丁日昌很高興，還送了他刻有「東寧才子」的一顆圖章，丘逢甲之名乃大噪，丘龍章遠道陪子赴試，本意只是試試看，不料竟然考中，且得學台大人的特垂青眼，這一歡喜，當然非同小可。但是很可惜的，現存的嶺雲海日樓詩集中，看不到這些被丁學台所稱賞的竹枝詞。大體上，嶺雲海日樓所收的詩，都是失台以後的丘氏作品，在台所作，當散失於抗日戰爭之中，這是極可惜的事。

丘逢甲少年得意於科場，自覺前途無量，自然格外興奮，格外努力，詩與文進步更快。他的父親，也對他慰勉有加，督責益勤。自此丘氏家族在台灣社會地位，也更受人重視。這一情形，當和丘逢甲的少年科第有關。逢甲既中式秀才，仍隨父讀書，兼任父課諸童蒙生於彰化王子社的丘氏家塾。光緒八年補廩生，年僅十九歲。翌年與廖慶芳先生之長女結婚。又翌年而中法以越南問題，發生戰爭。時劉銘傳守台灣，法軍曾攻佔基隆，但為劉銘傳所敗，法將孤拔受傷而死。但馬尾法艦則驟攻清艦，清艦受極大的損失。張

佩倫者以書生論政，號為清議派，為李鴻章所重。中法戰起，奉命督師福州，及聞法艦開砲，倉皇遁走，連鞋子都來不及穿好，一時傳為笑柄。逢甲先生時年二十歲，聞變，憂心忡忡，於是知國事之多艱，慨然有改革維新之志，而注重吸收新知識。翌年，法軍大敗於諒山，而清政府反在得勝之後，訂天津條約以和，故是年國父決心革命時。國父年僅二十歲，尙較逢甲先生少一歲，中法既和，福州安寧，故是歲仍舉行鄉試，鄉試的期間，普通都在八月，故有秋闈之稱，自台灣至福州，經橫渡台灣海峽。時劉銘傳經營台灣，移政治中心於台北，故淡水與福州之間已有直接渡船，不必轉赴台南而至廈門。但橫渡海峽，順風仍須三日，如遇逆風大浪，則須十餘日或一、二十日不等，五月（陰曆）以後為颱風季節，渡海遇險機會較多，故丘先生赴閩應鄉試，五月間即已啓程前往。時先生年二十二歲。這一次考試，未能如願；但他並不灰心，抱定「此科不中下科再來」的決心，依然很愉快地在遊覽福州的名勝古蹟以後，欣然返台，仍隨父讀書，佐父授徒，清政府在中法一役後，知台灣在海防上的地位，異常重要，因將台灣的政治地位提高，以便致力建設。

春闈告捷飄然而歸

在回台以後的第三年，先生年二十四歲，以秀才的名帖，參見當時的台澎道道台（倉海先生年譜作台灣巡撫，）疑非是，唐景崧。唐景崧奇其才學，收為弟子，並留其佐治文書。唐景崧是

廣西潯陽人，翰林出身，文事與政事，俱稱能手。逢甲先生得其指導，獲益良多，但是在不久之後，即辭去幕事，仍回王子社，專門讀書，時先生年二十四歲。是年，又赴福州應鄉試，得中三十一名舉人。先生鑒於上一次的失敗，戰戰兢兢，時恐難償所願；故捷報傳來，猶恐是同舍生中式，不敢應門而出；及聞姓名，始知自己中了舉人，始在匆忙中備紅包以贈報喜之人。這一喜訊，對丘家的清苦生活，略有貢獻。念台先生曾有下一段的口述：

「父親中過舉人回台後，還是跟着祖父過着艱苦的生活；但是沒有好久，環境已逐漸獲得改進了。那是由於俗諺所說有窮秀才無窮舉人的風氣所促成。因為：第一，有人願意出很高的束修，請他去教書；第二，有志科場的童生，常常請他批改文章，多少有些禮敬；第三，鄉間戚友，遇有婚喪喜慶，都用厚禮，請他出面，無非是藉有功名的人，以提高事主的身分。父親對於主持婚喪喜慶的託請，感到十分厭煩，經常避免參加。」（橫海微颺第一章第二節）

逢甲先生不歡迎婚喪喜慶的出面主持，一方面表示他不愛重禮，不願意做這一種俗套；而另一方面却是在準備赴京會試，專心攻讀，他是不以已中舉人為滿足的。

光緒十五年，先生年二十六歲。是年正月，啓程前往北京，應會試。會試的時間，常在春天，故稱春闈，這一科（己丑科）的總裁是廖壽恆與宗室崑岡。五月發榜，先生中式八十一名進士

。進士中式以後，照例是參加殿試，那是由皇帝親自主持的一種特別考試。時慈禧太后已終止垂簾聽政，光緒帝開始親政，也是他第一次主持殿試，臚唱賜二甲進士出身。照例，殿試以後，經由皇帝召見，在召見中，欽點工部主事，在虞衡司工作。但先生不樂意於仕進，故引見後即回籍省親，打算在故鄉致力教育與文化事業。先生澹泊的胸襟，及對其後來的發展，有極大的關係。

逢甲先生春闈告捷以後，回到台灣，即在光緒十六年，主講台中府的衡文書院，台南府的羅山書院，嘉義縣的崇文書院。三處往來，備極辛苦，但先生樂此不倦，欲為台灣培植人才，在文化事業上樹立規範。又以台灣通志，新的尙付缺如，乃提倡台灣通志的偏纂，而又兼採訪師。先生在中法之役，即感奮時貼括之學，無裨實用，已注意西方學說及經史致用之學的努力追求。及其主講三書院，不再重視貼括，僅應時下的需要，略課應試文藝，而以講學重心，置於中外歷史；並切勸諸生，多閱報章，藉以了解時局，擴大知識領域，蓋已作教育上的革新了。時先生結婚已七年，原配廖夫人已生二女，是年生一子不育，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，傳統的知識分子，都奉為明訓。乃於光緒十七年，先生年二十八歲，納呂夫人，時先生已家於台中府台灣縣的柏村了。

先生自京回台，始終主講三書院及兼任全台通志採訪師，先後達四年之久，至光緒二十年，即甲午年，中日戰爭發生，而先生生活始為之一變，也就是為先生發揮愛國家愛民族的精神，為台灣歷史與中國歷史寫下光輝的一頁。（上）